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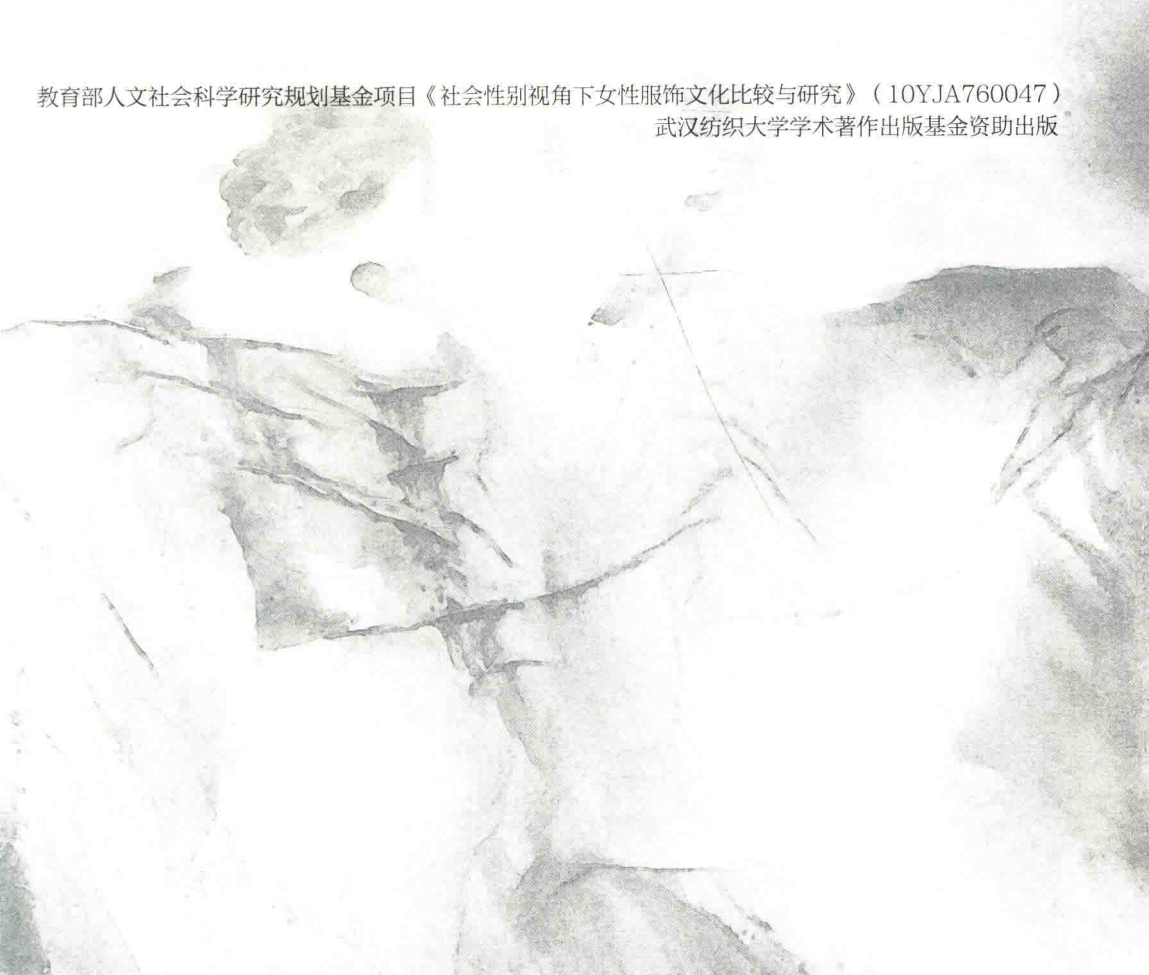
陶辉 等◎著

性别·服饰·伦理

——性别视角下女性服饰形象解读

东华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服饰文化比较与研究》(10YJA760047)
武汉纺织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陶辉 等◎著

性别·服饰·伦理

——性别视角下女性服饰形象解读

东华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服饰·伦理：性别视角下女性服饰形象解读 / 陶辉著.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669-1145-2

I. ①性… II. ①陶… III. ①女服—服饰文化—研究 IV. ①TS941.7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9040号

责任编辑：杜亚玲

封面设计：戚亮轩

性别·服饰·伦理：性别视角下女性服饰形象解读

著 者 陶 辉 等

出 版：东华大学出版社(上海市延安西路1882号，200051)

出版社网址：dhupress.dhu.edu.cn

天猫旗舰店：<http://dhdh.tmall.com>

营销中心：021-62193056 62373056 62379558

印 刷：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13.25

字 数：332千字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9-1145-2

定 价：58.00元

前言

对于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服饰文化的研究的兴趣缘起于2006年我在江南大学学习博士课程的时候，偶然机会读到了沈奕斐教授的《被建构的女性》和波伏娃的《第二性》，使我对服饰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思路。在对相关资料的查阅中，发现这类研究在中国服饰文化研究领域尚处在一个相对年轻的阶段。因此，我尝试着从这一角度对过去的服饰文化再认识。这些年自己作研究，或带着研究生一起去研究，或跟同事一起讨论思考，一些新的思路和小小的发现总是让人欢欣鼓舞，也就越发激励自己像个蹒跚学路的幼儿勇敢地向前。

研究过程中也遇到诸多障碍，有过犹豫，甚至退缩，这期间也得到了师长、家人、朋友、同事的鼓励和支持，最终坚持走了下来，才有了这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在此，对曾经给予了关心、帮助、支持的朋友和家人奉上我最诚挚地感谢，也对给予我支持的武汉纺织大学领导和有关部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这本专著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应该说蕴含了集体的力量。课题组的主要研究成员郭丰秋、尹志红、钟蔚、张元美等老师参与了专著的撰写工作。

我的几位研究生，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文字整理与图片绘制工作。其中，熊英和李文姣负责全书文字整理工作，孙抗和史丹娜负责图片绘制工作，同时朱佳媛、吴星语、张瀚汐、张静珮、刘洋君也分别参加了图片的绘制工作，SM Minhus参加了资料收集的工作。在此，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很幸运能跟这些优秀的学生一起度过难忘的研究岁月！

本书虽已成稿，但由于性别理论的研究本身还处在发展之中，加上自身的理论水平的薄弱、所处学科的制约，研究能力不足、撰写时间不充分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首次撰写学术类的专著，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也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将不胜感激！

编者

绪论

20世纪80年代末,琼·斯科特的文章《社会性别: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强调了“社会性别是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分子,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同权力的观念和权力的构成牵连在一起”。已有的研究表明权力的分配(对物质资源和象征意义资源的控制和支配)经常以社会性别观念为参照。服饰是作为性别直观显现的一个重要符码,是一种身体符号,同时也是表达权力的一个重要载体或途径,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服饰文化的构成显性或隐性都受到社会性别关系的制约。因此,从两性关系及权力关系变化上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诸多显著的女性服饰文化现象。

把社会性别纳入到女性服饰文化的评价体系,使我们能历史地、具体地、深入全面地了解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载体的女性服饰的意义与构成。尤其是女性在社会性别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作为服饰的主体所表现的服饰行为特征及身体语言,以及在维护和延续这种不平衡的性别体制中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这种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服饰研究局限性,拓展了服饰文化研究的视阈,也为当下处于学术前沿和研究热点的女性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一个实证研究。从历史的发展维度和空间地理维度纵横向考察女性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的服饰文化活动及构成特征,通过对中西方女性如何主动或消极地参与服饰文化的建构实证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在整个人类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格局中,社会性别体制对中西方女性社会地位、人格与审美的影响力及其发展趋势,便于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性别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是西方女权主义在对女性文化、历史、社会的剖析过程中发展的理论框架。过去人们从事服饰文化研究主要是基于文化、经济、战争、政治等视角,忽视了社会性别制度对两性间权利关系分配的影响。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展,有关女性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

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后,女性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推动。随着人们对社会性别体制的认知度提高,专家学者也开始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来重新思考或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或是现存的学术疑难问题。

目前国内就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服饰文化研究正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视点,有不少学者凭着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感悟力,已在该领域有了初步的建树,例如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撰写了《女扮男装——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着力在绘画、人物俑等材料中探讨唐代独具特色的女扮男装现象,指出这种现象有来自教育,家内、户外的生活,宫廷、都市活动,道教、佛教影响,个人性格等多方面的成因,不能单纯以胡化或是社会的开放解释。北京大学另一位知名学者齐东方教授发表的《唐俑与妇女生活》通过对唐代女俑分期、分式、分类的考察展示了女俑与丧葬制度的关系,有关女性的时尚的变迁、物质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以及女性在礼乐、劳动和社交生活中的面貌。忻州师范学院教师胡芸在《女性服饰在民俗行为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一文中通过对民间女性服饰行为的考证,思考了各种行为下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等。沈海梅在她的《族群认同:男性客位化与女性主位化——关于当代中国族群认同的社会性别思考》一文中就提到,西江苗族男性的“自我客体化”和女性的“主位化”的变化趋势也在打破传统服饰中男女性别服饰均衡的文化规则,构建出族群服饰性别不均衡的模式。在这种不对等的性别权力关系下,服饰作为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被固定到女人身上,让女人承载起族群文化传承的重任。

由于西方女权运动启蒙较早,因此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早于国内,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美国夏威夷大学的Linda Arthur撰文*Dres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Two Sororities*就女性理想形象和社会角色建构展开了讨论,提出妇女联合会对女性气质的构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女性通过日复一日而被建构。另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Susan Kaiser教授撰写了*Feminist Issues in Textiles and Clothing Research: Working Through/With The Contradictions*,强调了在纺织服装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话题的研究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Cheryl Buckley等在2002年出版的*Fashioning the feminine*中主要针对1890—1999年期间英国服装,研究时装、社会性别以及表现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美国学者高彦颐在其著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中针对以往研究中忽略传统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事实,将她们视作凝滞不变的非历史同质性客体,漠视了两性权力关系与女性个体在社会、

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提出了对于缠足，传统妇女不仅主动参与，还在缠足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的研究观点。

上述研究无疑为当代女性服饰文化研究拓展了思路，奠定了基础，也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课题研究发现，女性在服饰文化建构上总是在一种自觉与不自觉中交替进行，社会性别的不均衡导致女性在权利分配上呈现弱势状态，女性在试图改变这种状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服饰现象，作为身体符号被强化，同时服饰作为一种遮盖与显现的游戏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绪论



第一章 神性与人性的博弈 / 1

第一节 “女神”与“女人”的转换 / 2

第二节 “上帝”与女性 / 14

第三节 “美丽”的女性 / 25

第四节 觉醒中的女性 / 36



第二章 礼制与情欲的对抗 / 47

第一节 华彩昭昭永未央 / 48

第二节 女着男装的文化探源 / 60

第三节 爱恨交织的三寸金莲 / 71

第四节 欲说还休的近身衣 / 79

第三章 族群与身份的表达 / 89

- 第一节 亚族群的文化符号 / 90
- 第二节 不能承受的身体之痛 / 101
- 第三节 服饰与社会角色的对话 / 109
- 第四节 “遮蔽”与“显露”的游戏 /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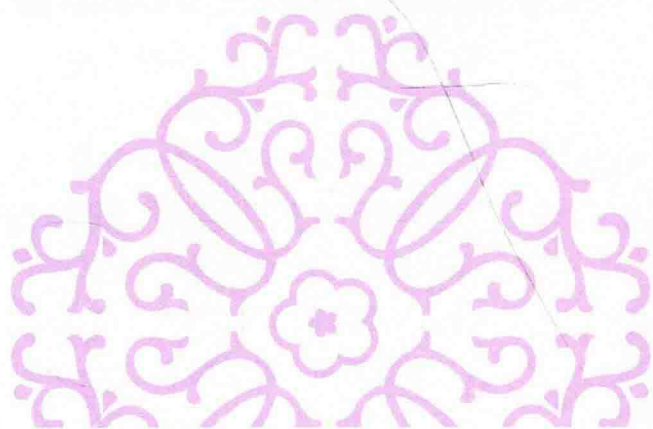
第四章 身体与时尚的对话 / 139

- 第一节 裸露的现代象征 / 140
- 第二节 内衣外穿的逆袭 / 149
- 第三节 一双黑丝袜的折射 / 156
- 第四节 恨天高之虐的伦理 / 163



参考文献 / 173

附录 / 181



第一章
神性与人性的博弈



第一节 “女神”与“女人”的转换

一、从“神”到“人”

服饰是对一定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古希腊、古罗马服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艺术学研究者大多关注到古希腊服饰的设计美学和哲学意义，很少从性别视角观察其服饰文化特色。实际上，在古希腊现实生活和服饰文化中，男女性别界限和建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安德鲁·斯图尔特在《古代希腊的艺术、欲望和身体》一书中指出的：“希腊艺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男人大部分是裸体的或部分裸体的，而女人通常则是着衣的。”^①进一步来说，“裸体”还是“着衣”，以及如何“着衣”成为社会性别角色区分或建构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说过，“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我们从希腊神话中，可以窥见时人的性别观念。根据历史分期，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化被称为“古风时期”；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文化达到鼎盛期，被称为“古典时期”；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进入希腊化时代。

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希腊先民崇拜祖先的女神，而女神是备受尊崇的妇女形象的升华，这与女性在生产劳动和人类繁衍中的主导作用密切相关。因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宙斯可以为了欧罗巴而屈尊变成一头牛；天后赫拉、智慧女

① Andrew Stewart. *Art, Desire and Bod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24.

神雅典娜和爱神阿芙洛狄特会因“美貌”而争夺金苹果；特洛伊王子因为海伦的美貌而抛权力与功名，特洛伊城的居民也因其美貌而原谅其带来的战争之祸。现实中的爱琴文明女性服饰形象以克里特岛的持蛇女神最为经典，如图 1-1 所示，她双目圆睁，手持双蛇，双乳高耸，显示出神秘、大气和力量。由此也可推断，克里特女子在生活中常常裸露乳房，上衣由数片缝合在一起，紧裹身体，强调腰身，下身的裙子膨大，夸大臀部造型。此时，女性的第二性征在服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此时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图1-1 克里特岛的持蛇女神

《荷马史诗》所描绘的是迈锡尼时代到英雄时代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此时已是父系氏族社会中晚期，女性的“神化”地位逐渐让位于“英雄”，在强大的父权制碾压下，女性甚至丧失了作为“人”所具有的一切权利而沦落为社会最底层的“女奴”形象。在《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历来是忠贞不渝的理想妇女形象。她在宫殿里等待了奥德修斯 20 年，除要独自对付着种种流言蜚语，还要一边操持伊塔卡王国的政务，一边抚养倔强不驯的儿子，同时还得抵挡一百多个求婚人的纠缠，实际上成了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奥德修斯回来后，杀死了所有求婚者，连同家中的 12 个对主人不够恭顺的女奴。从现存图像上看，荷马时代的希腊女性形象是束腰凸臀服饰造型，与男性宽肩细腰、腿部肌肉丰满的服饰造型形成鲜明对比，继承了克里特文明中的女性生理性别特征，然而到了古风时代，女性形象转向保守端庄，圆筒形的服装虽然紧裹身体，但显得生硬而古板，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古希腊女性社会地位和角色转变的表征之一（图 1-2、图 1-3）。

从古典时代开始，希腊社会文化中的性别观念逐渐确定下来。首先，社会文化中的阳刚气和女人气从经典的服装希顿中体现出来。希顿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为“麻布的贴身衣”，分为多利亚式和爱奥尼亚式两种（图 1-4、图 1-5）。最初的希顿是多利亚人所穿，公元前 6 世纪前后，所有的希腊女性都穿这种希顿，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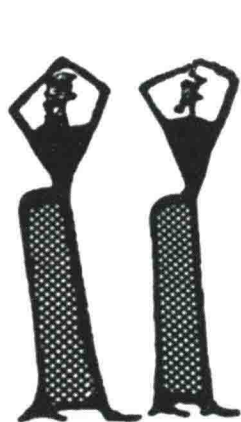


图1-2 荷马时代的人物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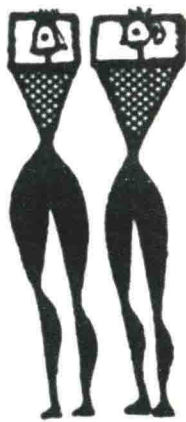


图1-3 古风时代的女性形象

称为“多利亚式希顿”。它是一块长方形的白色毛织物,毛织物比较厚重,垂感较好。其一般用量为长边等于伸平两臂后两肘之间距离的2倍,约183厘米,短边等于从脖口到脚踝的长度再加上脖口到腰际线的长度^①,当穿用的时候,先把长方形的一边向外折,然后将两条短边合在一起对折,包裹身体,之前的折返部分提到肩部用两个别针固定,多余的布料自然地垂挂在身上形成垂褶。

爱奥尼亚式希顿最初是男子的衣服,后来男女共用。主要由亚麻织布做成,十分轻薄,也是一种长方形的布,和多利亚式希顿相比,其样式有所变化,例如后者有折返,前者没有;后者的侧缝一般不缝合,前者必须缝合;后者没有袖子构成,前者则有;后者只用两个别针在双肩固定,前者则需要用安全别针自肩到两臂固定多处。所以,多利亚式希顿的特征是造型单纯、衣褶厚重粗犷,人们将其与简朴庄重的男性特征联系起来。爱奥尼亚式希顿的特征是造型柔和,衣褶细腻丰富,具有优雅的女性特征。

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看,此时的希顿虽然男女共用,但人们不自觉地将其特征与男性的阳刚之气、女性的阴柔之气联系起来,强化了两性之间的区分。另

^① 李当岐:《西洋服装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88。



图1-4 多利亚式希顿



图1-5 爱奥尼亚式希顿

一方面，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在雅典，本来人们都穿多利亚式的希顿，但当女人们犯口角时，那固定希顿的别针就成了凶器，曾刺死过人，因此，多利亚式希顿被禁止穿用，爱奥尼亚式希顿取而代之。”由此是否可以说，希腊人的理想女性形象从彪悍有力转向温顺秀美？

其次，两性气质的构建从遮蔽与裸露着装行为中体现出来。斯图尔特指出，在古希腊艺术中诚然存在着女性的裸像，但大多是处于这种性别阈限之外的非正常状态之下的女人，比如被强奸的女性、妓女，甚至包括了运动中的斯巴达的未婚少女^①。而传统的希腊女性一般固步于家庭生活，照料子女丈夫，主持管理家事等，即使外出也要从头到脚用衣服包裹得严严实实。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已婚女子，她们常常穿用包裹头部和身体的希玛纯，搭配长及脚踝的希顿（图1-6）。而“裸体已经称为男性公民的世俗‘服装’，他们在身体上区别于奴隶，

① Andrew Stewart. *Art, Desire and Bod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1.



图1-6 用希玛纯包头的希腊女人

在身体和‘服装’上区别于妇女和野蛮人”，因为“一个‘真正的’女人首先是一个文化的产物，是由男人来塑造和观看的”^①。也就是说，与女性的“着衣”一样，男性的裸体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服装”，其目的是为了展示男性的权力，裸露与否、裸露多少成为区分男女性别的标准之一。又如另一种叫做埃珀米斯（Epomis）的希顿，但没有多利亚式希顿的折返，这是希腊女性穿着的无袖丘尼克，男性也常常穿着，但女性的下摆就比男士的长一些。

除此之外，著名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也拒绝已婚妇女的加入。至于原因，有学者指出：

“这并非由于比赛的男运动员裸体，有碍妇女观瞻，而是奥林匹亚是宙斯的圣地，奥运会是男人的节日。”^②公共空间的性别区分建立在社会性别角色区分之上，大部分希腊人认为，已婚妇女的主要职责是家庭，而不是公共活动。即便是妇女出外的时候，穿的衣服不许超过3件，带的饮食不许价值超过1奥玻尔，饭篮不许高过1寸。她们不许夜行，除非是坐在四轮车上，在车前挂灯照路。著名的改革家梭伦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妇女监察委员会”，专门处理妇女在公共场所的出格行为^③。当然也有例外，希腊城邦斯巴达的少女甚至妇女们可以裸露着大腿参加体育锻炼和比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奥林匹亚举办的“赫拉节”，据鲍桑尼阿斯记载，赫拉节运动会也是每四年举办一次，只设有一个未婚少女的赛跑项目，跑道比男子的短六分之一，分为三个年龄组进行比赛。比赛的时候，少女们把头发披下来，可能身穿叫做“埃克索米思”（Exomis）的服装，这是希

① Andrew Stewart. *Art, Desire and Bod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6, 38.

② 王以欣：《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亚赛会起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62。

③ 林中泽：《早期西方文明史札记》，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56。

希腊独有的服装，犹如现代的斜肩吊带，在一侧肩头固定（左右均可），其下摆稍高于膝盖，肩部裸露至乳房位置。亚马逊女战士、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也常穿这种服装（图 1-7）。但对于古希腊的普通人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有伤风化的恶俗现象，斯巴达妇女也就成为轻浮乃至淫荡的女人的代名词。在希腊语中，有一个词 Phainomeris，字面上的意思是“露出大腿的人”，专门用来指像斯巴达妇女那样的伤风败俗的女人^①。亚里士多德曾抨击道：“斯巴达的妇女气曾经消磨了他们固有的丈夫气，从而造成最恶劣的后果。当忒拜



图 1-7 穿埃克索米思的斯巴达少女和男子

人入侵的时候，斯巴达妇女就大大不如它邦的妇女，她们表现得十分慌张。斯巴达男子们受到自己妇女的纷扰比所受敌军的袭击还要严重。”^②

由此可见，作为民主政治的源头，古希腊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十分自豪，这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公民集体。女性可以拥有公民身份，但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她们唯一的公民身份就是作为男性公民之妻，是唯一能生育公民的群体。在古希腊作家笔下，女性被书写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女妖魔和不同类型的雌性动物。女性意味着软弱、疾病和灾难。研究者对古典著作中涉及的雅典名门望族的家庭人口统计调查表明，在 346 个家庭中，有 271 个家庭的儿子多于女儿，而其中男孩与女孩的比例为 5:1^③。这是城邦控制男女性别出生比例的结果。因此，古希腊的妇女可以与男性共享某类服装，在服饰形象上可能比男性更具有丰富

① Stephen G. Miller. *Ancient Greek Athletic*.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249.

② 解光云：《论希腊人“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6）：696。

③ Sarah B. Pomeroy, *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67-68.

和迷人之处，但其本质仍旧是男性公民观赏的对象，在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中，女性处于失语境地。

二、地位的“起伏”

与大多数古代文明相比，罗马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相对较高的威望。无论是历史传说还是文献记载，妇女在罗马国家形成和崛起的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尤其是罗马共和制早期，妇女们有很高的威望和得到很多赞许。正如《情爱自然史》中描绘的：“罗马妇女曾一度是力量和道德完美结合的象征——她们髌骨宽大，身体健壮，有生育后代的能力，能织布纺纱，操持家业，是早期共和国严厉而又粗鲁的农民武士的适宜伴侣。使妇女和男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虚无缥缈的罗曼蒂克式的追求，而是对宗教的虔诚，部落内部的团结纽带以及为了求得经济和军事上的谋生手段的迫切需要。”^①然而，从社会性别角度关照的话，罗马从一开始就是父权制社会。对罗马妇女的赞颂和欣赏也是基于父权观念之上的。从发掘出来的古罗马墓志铭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写给妻子或母亲的溢美之词，但基本上都是夸赞她们作为家庭主妇的良好品行。例如她“是一位细心的家庭主妇，节俭整洁，行为正派，光明磊落，虔诚又朴实”“最好，最美，从事纺织，虔诚，知廉耻，端庄，贞淑，足不出户”^②等。

从服饰形象来看，最初的罗马服装与希腊服装一样，性别区分并不明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服装上的性别意识被刻意强化，甚至对立起来。男性的外衣有托加(Toga)、拉凯卢那(Lacerna)、萨姆(Sagun)、帕鲁达门托姆(Paludamentum)、帕留姆(Pallium)、帕奴拉(Paenula)等，一般女性的外衣只有帕拉。作为外衣穿的帕拉，是罗马女性的礼仪性服装，材料一般为毛织物，厚度和大小不定，穿法与希腊时期的希玛纯完全相同，常常在左胸处用一个圆形的胸针固定。男性的内衣是丘尼卡(Tunica)和达尔马提卡(Dalmutica)，女子的内衣有斯托拉(stola)。斯托拉就是雅典妇女的希顿，一般用毛织物制作，后来也有用亚麻或

① 转引自王大庆：早期罗马妇女与传统的女性观试探，天府新论，2006（1）：137。

② 同上。